

閱讀與批評：文龍評《金瓶梅》

陳 翠 英 *

提 要

明代世情小說《金瓶梅》有三種評本。在「崇禎本」簡略的批語基礎之上，清人張竹坡、文龍相繼對該書作了豐富的批評，其中文龍評點由於發現較晚而猶有許多值得深入論述的空間。其內容涉及人物評述、小說技巧、辨析《金瓶梅》情色描寫以及揭示《金瓶梅》「嫉世病俗」義旨，由於文龍是直接寫在竹坡的評本之上以作出回應及批駁，此一「對話者」的立場使其評點充滿批判色彩，尤其是對書中若干女性的評價文龍更與竹坡針鋒相對；亦因在激烈的論辯之中逼顯出對「閱讀」、「批評」等文學活動的多面思考。讀者的態度、條件為何？閱讀應該遵循那些規則？由《金瓶梅》「以淫為戒」的深旨出發，文龍認為閱讀召喚了讀者的道德意識，期許讀者為具有高度理性的良知主體，道德意識的惕勵昂揚即是閱讀的終極關懷。而藉由對竹坡評點的強烈質疑，文龍評點彰顯了對讀者主體意識的重視，認為讀者、作者互為主體而共同建構小說意義，其說不僅承襲傳統小說評點的特質，亦頗能契合當今文學理論，因而在小說批評史上應有其值得肯定之地位。

關鍵詞：《金瓶梅》、文龍、張竹坡、閱讀、批評主體、對話

本文 90.9.28 收稿，90.11.14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Reading and Criticism : Wen Long's Comments on *Chin - P'ing - Mei*

Chen Chui-ying

Abstract

To date there are three extant critical edi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novel *Chin-P'ing-Mei*. On the basis of the brief comments to be found in the Chung-chen edition, Ch'ing dynasty scholars Chang Chu-po and Wen Long went on to offer extensive critical commentaries. Of these two editions, the Wen Long version was discovered relatively recently and offers a number of points worthy of further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its critique of characters, discussion of novel-writing techniques, analysis of erotic passages in *Chin-P'ing-Mei*, and exposition of the cynical undertone of the novel. Since Wen Long wrote his comments directly next to those of Chang Chu-po as a type of response and rebuttal, this "dialogue" format serves to give his comments a highly critical tone,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critiques of som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Likewise, in the course of this heated debate, Wen Long gives serious consideration to the acts of reading and criticism,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what the reader's attitude is and what rules should apply to reading. Taking his cue from *Chin-P'ing-Mei*'s theme of using excess as a warning, Wen Long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reader is a highly rational, conscientious entity and that reading stimulates his or her

moral awareness. On this view, the ultimate goal of reading is to provoke and promote moral awareness. Through his strong questioning of Chang Chu-po's comments, Wen Long shows the emphasis he gives to the reader's self-awareness and his belief that the reader and the author are equally important and together construct the novel's meaning. Wen-Long's comments not only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the critique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but also echo modern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as such make Wen Long deserving of 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iticism of the novel.

Key words : *Chin-P'ing-Me*, Wen -Long, Chang Chu-po, read, critic subject, dialogue

閱讀與批評：文龍評《金瓶梅》

陳 翠 英

一、前 言

明清時期，伴隨小說創作進入成熟階段，小說批評亦蔚為盛行，尤其是明中葉以後至晚清，更由序跋、評點發展成長篇理論，豐富的小說批評展現旺盛的文壇活力以及紛繁風貌。① 以明代「四大奇書」為例，各部著作皆歷經不同批者之手，評點的工作不僅涵括對小說主旨、技巧的論述，批者時或直接取作者而代之，參與文本書寫，小說遂有多種版本流傳，甚至是以評點家之“點定本”流行。其中有關《金瓶梅》的評論，除了散見序、跋及文人筆記，當以崇禎本《金瓶梅》② 為首部涵括眉批及夾評的評本；其後經張竹坡進一步評述論斷，③ 二家批評遂成為《金瓶梅》

-
- ① 關於明清小說批評之發展概況，參見王先霈、周偉民：《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廣東：花城出版社，1988）；方正耀：《中國小說批評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72-74；林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其他相關論述請參見文中引用之各部小說批評史、小說理論史以及專著論文等。台灣學界多篇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以小說評點為研究對象，成果亦甚為可觀。
- ② 書名為《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上）（下）（齊煙、汝梅校點，香港：三聯書店、山東：齊魯書社，1990年），以下簡稱「崇禎本」。
- ③ 張竹坡的評點以下簡稱「張評」。本文所參考為《第一奇書—竹坡本金瓶梅》（康熙乙亥年1695張竹坡評在茲堂本《金瓶梅》）（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金瓶梅會評會校本》（上）（中）

評點的代表作而廣為後人所知，「詞話本」則遲至晚近（1932）才被發現。而「崇禎本」、「張評」之外，近年來學者發現另有第三家評點，此即清代文龍的《金瓶梅》批評。^④ 文龍批評《金瓶梅》是直接寫在竹坡本之上，以回評為主，涵括旁批、夾批，屬於未刊行的評點稿本。由於文龍是以踵繼前人、延續對話的方式呈現，其與張竹坡的觀點既互相交涉亦迭有異同，因此其批判性、對話性特別明顯，甚至時有激烈的意識交鋒。而《金瓶梅》文本在流轉多人的評點過程中，與具有不同心靈內容、價值取舍各有側重的閱者、批者相遇，遂能在讀者的參與中拓展繁複多樣、甚至旨趣迥異的豐富面貌。

文龍評點《金瓶梅》時已屆清末，彼時小說批評卓然有成，李卓吾、金聖嘆、毛宗崗以及張竹坡等先後在相關領域展現豐富論述，文龍自然也承繼了若干古典小說批評的傳統特質。諸如探討小說文本的結構、小說敘事章法、乃至小說人物刻畫、修辭技巧等前人廣泛涉及的領域，文龍多有所延續。另一方面，文龍評點以其後起之姿針對竹坡評點展開質疑論辯，激蕩出與其迥不相侔的觀點；也由於這個「對話者」的後設位置，層層剖析推衍而出有關閱讀活動的多重省思。這種對批評活動本身所作的深層觀照及後設思考，乃至讀者主體意識的興起、「評論家」身份的建構，早在宋代劉辰翁評點古籍即已首開先聲，明清時期的小說評點亦有所踵繼，^⑤ 康熙

（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④ 文龍，本姓趙，字禹門，約生於清道光十年(1830)，光緒間曾任南陵、蕪湖等地知縣，為官清正，可參見《安徽省南陵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九五號》)卷十七，頁218。文龍評點《金瓶梅》涵括眉批、旁批及回評，共約六萬餘言。回評獨立成篇，分別於光緒5年(1879)、6年、8年，三次手寫在「在茲堂刊本」張竹坡評點的《第一奇書》之上，屬於抄評本，在1985年為學者劉輝在北京圖書館發現；其後並加以著錄出版。有關發現、整理、出版過程及文龍評點的相關資料，請參見劉輝〈略談文龍批評《金瓶梅》〉、〈文龍及其批評《金瓶梅》〉二文，分別收入氏著《〈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中。此外參見黃霖在所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五所作介紹；孫蓉蓉的研究論著亦有述及。

⑤ 有關讀者主體意識的增強，參見譚帆：〈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文本價值〉，《學術月刊》

時期更盛行多人評點、批上加批的文學現象，^⑥ 文龍的批評正是奠基於前人的評點成果，而在深度及廣度上皆有所拓展。在辨析《金瓶梅》的章法、旨趣、人物之外，有關讀者、評者如何面對文本？閱讀是否應該遵循若干原則？意義如何把握？讀者與作者的關係、讀者之間的交鋒可以開展那些向度？凡此皆是文龍評點廣涉的問題，其說開啟了多重的批評視域，尤其是針對張竹坡的批評展現與之互相對立的觀點，從人物論斷到小說的表現方式，其評述慷慨恣肆跌宕有致，雄辯滔滔極具個人特色，展現了小說評點的成熟風貌。本文探究文龍的《金瓶梅》評點，除了瞭解其中的架構體系、小說美學，尤重剖析文龍對閱讀、批評等文學活動所闡發的理論；以及其說與竹坡評點之間的對話與異同。

二、文龍評點概述

明清文人積極參與小說批評，增飾、刪修等改易的工作，使小說評點深具重新書寫的創作意涵。此一批評取向所締造的「文本價值」以明末清初成果最豐，直至乾隆以後方才趨於消歇。^⑦ 文龍評點《金瓶梅》^⑧ 或因已屆清末，在批評取徑方面並未以「文本價值」取勝；亦因其說並未付梓刊行，故在學者整理出版以前，其

1996年第12期，頁100。劉辰翁評點的後設性，參見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國文學誌》(彰化)第三期(1999年6月)，頁201-203、206-207。

⑥ 參見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374-375；楊玉成：〈小眾讀者：康熙時期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19期(2001年9月)。本文寫作期間，承楊玉成教授先行惠予〈小眾讀者〉一文以供筆者參考，謹此致謝。

⑦ 譚帆在〈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價值系統〉，《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指出中國古代小說評點大略涵括「文本價值」、「傳播價值」以及「理論價值」，「文本價值」即是指小說評點家所作改訂的成果，頁93-96。至於小說評點之興衰流變，見該文頁94。

⑧ 以下簡稱「文評」。文龍評點以回評為主，後文引用時將逕行註明回數，若引自其他部份則予以詳註。

「傳播價值」^⑨亦付諸闕如。然而其內容涵括對《金瓶梅》全書旨趣、人物、技巧的賞析，這方面與批評傳統及當時風尚並無差別；至於對閱讀、批評等活動的省思則尤見功力，明顯與其之前的評點有所區隔。文龍作為一個小說「讀者」、並且意圖指導「讀者」的傳承心態是非常顯豁的，因此儘管「文評」發現較晚，卻仍可將其繫屬小說批評史的傳承脈絡之中。茲先概述「文評」的整體架構及批評重點，以見出其閱讀《金瓶梅》的鑑賞尺度及法則，進而彰顯其評點尤重「閱讀」、「批評」的特殊之處。

（一）、人物評述：厭女情結、禍水論及男性批判

傳統小說批評迭經明末以迄清初的發展，已奠定以人物批評為中心的賞鑑趨勢，^⑩尤其「回評」形式的人物論斷大多重在道德評判。另一方面，《金瓶梅》以刻畫女性形象為著，有關書中多位要角的優劣褒貶，歷來就是評家爭議的焦點，^⑪「文評」秉承這兩方面的論述主軸，其評述人物深具道德意識而處處展現衛道姿態，對西門慶、陳經濟的批判固是不遺餘力，至於書中女性要角如吳月娘、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孟玉樓，文龍亦皆著墨甚多，無論是單獨評論抑或藉由人物比較以區分軒輊，文龍呈現相當傳統的女禍觀。《金瓶梅》動輒以刀、劍、鎗、或以金剛、魔王、豺狼、蛇蝎等野獸比喻女人，文龍對此可謂全盤承襲甚且尤有過之，例如批評潘金蓮，計有「淫貨」、「毒物」、「妖精」、「淫蟲」、「妓」、「浪傢伙」、「瘋狗」、「禍水」、「淫人」、「尤物」、「淫婦」等罪名，^⑫金蓮成為其撻伐的箭垛：

⑨ 譚帆區分「傳播價值」為內外兩端，外在現象指評點對小說傳統和普及的促進；內在形態則表現為對讀者的閱讀影響和指導作用。同註7，頁96-99。

⑩ 學者多指出此一特色，參見張少康：〈晚明小說理論中的幾個基本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1994年第1期，頁30；譚帆，同註7，頁98。

⑪ 方正耀，同註1，頁163；177-197〈典型論的誕生〉；至於道德評判的特質，另參見該書頁139。

⑫ 以上批語分別見於13.24.28.31.32.33.35.39(59).50.87.89回。

「月娘、嬌兒、玉樓得好丈夫，尙是安分之婦，瓶兒亦可爲善之人，獨有金蓮，可殺而不可留。」(三十二回)

「但瓶、梅尙可轉移，蓮則斷斷不可存留於世間，遭之者死，見之者病，誠然禍水也。」(七十七回)

金蓮是一個必須滅除的對象，文龍可說視金蓮爲首惡而深惡痛絕。批瓶兒也是詞鋒凌厲，認爲瓶兒在花子虛死後未滿五七再嫁，乃「良心已喪，天理全無。」(十四回)。其他如批孟玉樓「陰險」，「天下豈有一嫁再嫁，猶稱爲賢良之婦哉？」、「又不自己出頭，卻來調唆金蓮，險人哉！」(二十九回)；批春梅則「其狠也，在金蓮之上；其淫也，不在金蓮之下。」(八十三回)，其女性觀冷酷森寒極端保守，乃至明言：

「自古及今，大而天下國家，小而身心性命，敗壞喪身於女子小人之手者，正指不勝屈。」(二十三回)

文龍顯然延續了史家一貫相承的女禍史觀。^⑬ 其實正如《金瓶梅》文本是從多重面向呈現人性，文龍並非一無其他觀看女性的心靈空間，例如認爲瓶兒是「婦女中之溫柔者」，「遇之者亦孰不爲之傾倒也哉？」(五十四回)，頗有稱許之意。此外評述瓶兒進入西門家之後，亦頗多肯定：

「西門慶何獨於瓶兒一往情深也？此則瓶兒實有以感動其心者。自入西門之家，溫柔安靜，並無遽色疾言，財物不敢自私，即身骸亦不敢自愛，一任西門慶之所欲而爲之，以至因此而得病，病而至於不可爲。」(六十一回)

只是整體言之，文龍對女性的同情仍相當薄弱，其特許瓶兒「溫柔」、「安靜」等從夫順夫的婦德，亦不出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

不過文龍對所謂淫、妒之行，其批判的矛頭則是同時指向兩性，他認爲女性悖

⑬ 有關女禍史觀，參見劉詠聰：《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年)〈家國篇——紅顏是否禍水？〉，頁3-48。

離道德及傳統規範的言行是男性所引逗開發出來的：

「世上人未有不愛美婦人者，而婦人之美者，未必皆喜淫而善妒。群起仰慕而逢迎之，愛之如瑤草琪花，視之如奇珍異寶，奉之如神明父母，縱之如愛女嬌兒，爭之可以舍性命，被家財，忘憂焦，喪廉恥；到手則顛鸞倒鳳，暮雲朝雨，婦之不淫者，亦不覺勃然動情矣。如其願則爭妍獻媚，拂其意則忍淚含嗔；一旦奪其所歡，失其舊寵，有不挾小嫌而成大恨，變巧笑而為嬌啼者哉！遂使天下之美婦人，竟無不淫而且妒者。」（三十三回）

女性終究是爭妍獻媚、含嗔嫌恨並且喜淫善妒的禍害之源，「文評」字裡行間流露對女性的嫌惡，其中自有牢固的物化女性思想，所謂「丈夫如此，何論婦人，士君子且論，何論愚婦女。」（三十三回），正是文龍歧視女性、貶抑女性的宣言。然而他也指出男人仰慕、逢迎、寵幸女人，甚至為爭奪女人而捨命拋財，無憂無恥，男性開發女性情欲，也激發女性爭寵的妒心妒行，正因為女性是男性的瑤草琪花、奇珍異寶，可以恣其所歡，男性賦予女性成為欲望主體的可能：「遂使天下之美婦人，竟無不淫而且妒者。」，實有將批判焦點指向男性的意味。文龍在一貫對女性嚴厲撻伐之餘，或因參透世故人情，或因客觀觀照兩性互動，類此論述稍稍稀釋了其牢固的厭女心態，或可說是難得的男性批判。^⑭

（二）、藝術鑑賞：寫實技巧與結構安排

明清小說批評注重分析人物典型，張竹坡如此，^⑮ 文龍亦然。在前述偏重價值評斷的人物分論之外，文龍也從「典型」的角度分析人物，^⑯ 注意到小說的藝術經

⑭ 張國風在〈文龍的怪論〉中即論及這可能是文龍的創見，見氏著《〈金瓶梅〉描繪的世俗人間》（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198-199。

⑮ 方正耀，同註1，頁187。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亦提及竹坡注重人物性格的發展，頁70。

⑯ 參見孫蓉蓉：〈文龍的《金瓶梅》典型論〉，《金瓶梅研究》第3輯（1992年6月）。

營，認為「作者於有意無意之間，描寫諸人言談舉止、體態性情，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七十七回)。例如剖析兩位要角：

「若潘金蓮者，處處有之，吾亦時時見之。」「潘金蓮，亦不必實有其人也。」
(第五回)

「今之世上，果有西門慶乎？而吾未見其人也。今世竟無西門慶乎？而吾曾聞其事也。」(第十回)

「此等事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十三回)

「不必實有其人，未見其人」是掌握到小說的虛構性；「處處有之、時時有之」、「曾聞某事」，則是體會到小說乃是建立在符合生活常情常理的基礎之上，而有其普遍性及現實性，足見文龍肯定《金瓶梅》寫實方面的成就。又如詈罵西門慶沈淪墮落之外，他也注意到人性中的普遍特質：

「此實絕非真情，全非正理，而天下確有此等人，確有此等事，且遍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勝浩歎哉！」(六十三回)

「西門慶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罵。世界上恆河沙數之人，皆不知其誰，反不如西門慶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門慶未死之時便該死，既死之後轉不死，西門慶亦幸矣哉！」(七十九回)

說「該死」，類如評論中一再的指責，是道德評斷；至於「不死」，則是看到了小說的人物塑造成就了永恆的文學形象，肯定了小說的藝術成就。

有關小說的結構脈絡，張竹坡已評述甚詳，^① 文龍亦對此深有體會，強調閱讀要前後照應：

「上一回與下一回，均是半苦半樂，一喜一憂。如天時一日之間，半天晴日

① 方正耀，同註1，頁204。

皎潔，後半天陰雨淒涼。又如地方百里之內，前五十山路崎嶇，後五十大道平坦，漸有滄桑景象。正是消長機關，不似五十回前，得意順心，逢凶化吉。從此六十回後，迴光返照，樂極生悲。看《金瓶梅》者，當於此處留神，不可含糊看過也。」(五十九回)

其說以天象、道路譬喻人生起落，剖析小說脈絡也揭示小說「無常」深旨，比喻生動貼切，本身即展現美感體驗，並且和竹坡所強調的「冷熱」、「真假」有同工之妙而可互相參照。再如強調閱讀時須兼重「分觀」、「合觀」：

「實作者結構緊嚴，心細如髮，筆大若椽，分觀之而不覺，合觀之而始悟也。」
(九十八回)

也是視小說為一有機整體，提醒讀者不可等閒瀏覽。至於文字細節文龍亦未嘗輕忽，如「文字忌直」；稱贊作者是「白描妙手」、「寫生妙手」(七十一回)；又有「暗點」、「明點」(七十八回)之說，指引讀者掌握全書主旨。他也注意到八十回以後筆力未逮，「九十回以後，筆墨生疏，語言顛倒」(九十二回)，藉此對照之前的寫實成就。類此有關小說美學的觀照，在比重上雖然所佔不多，但多切中肯綮，展現其隸屬明清評點風潮中的一個環節，亦可見出文龍評點的面向甚為寬廣，其中又以對閱讀及批評的省思最為深入。

(三)、淑世襟懷：嫉世病俗、尊儒尚禮

以《金瓶梅》為始的世情小說蔚為盛行之後，由於其內容大多反映人間百態，小說批評亦隨之形成以評斷世情為核心的風潮，^⑧ 批評者往往在臧否人物之後繼而慨嘆世道人心。文龍評點亦與此一批評取徑相合，其說大抵依循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以來直至張竹坡之說法，認為《金瓶梅》描繪世情萬象，旨在批判朝政、

^⑧ 參見方正耀，同註1，第三編第二章〈世情說的貢獻〉，頁159-176。

嘆慨世態炎涼。「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觸而為此書也。」(七十二回)；也因為文龍置身清末宦場之中，浮沈其間世累既深，遂多藉評點論述世道人情。每每在剖析書中人物言行之後，進而延伸至其所置身的情境，在回評、附記中感慨紛至：

「此中消息，可爲知者道，難與俗子言也」(四十二回)

「顧何以大千世界，竟成一個勢利之局。」(四十三回)

感時憂懷，警惕世人，文龍顯然從《金瓶梅》文本汲取觀照世情、體察人性的智慧，這些理念也是他與重視教化的傳統小說觀相合之處。例如批評西門慶娶瓶兒時大肆鋪張：

「世道人情，一至於此，作者神傷，閱者能勿心痛乎？」(十七回追溯十六回)

文龍以素樸善感的心靈面對《金瓶梅》的奢華世界，遂有切身的心痛之感。又如對宋蕙蓮攀附西門慶不以為然：

「善讀書者，於此回蕙蓮，其光景情形，詳細玩味，便可觸類旁通，則所以待女子小人者，思過半矣。」(二十三回)

引申批評當世士人是小人得勢「耀武揚威」，不知興利除弊，「皆蕙蓮之流也」(二十三回)，文龍對蕙蓮後來自縊受難的下場並無同情之意，且譏其「量隘識淺」、「可恨可哂」，此中自有歧視女性的階級意識及父權盲點；不過這句話也揭示他將閱讀納入生活的課題，進而觸類旁通，視小說為洞鑑人性的依據。亦因其懷具強烈的道德意識，對書中人物的集體沈淪，批判遂不遺餘力：

「服未滿便嫁人，謂之浪。金、玉、瓶三人，而謂其非急色，不思淫，豈可得乎？」(三十八回)

「此三人故淫婦中之翹楚者也，李瓶兒死於色昏，潘金蓮死於色殺，龐春梅

死於色脫。好色者其鑒諸！貪淫者其鑒諸！」(九十七回)

情欲肇致理性蒙昧、殺機暗潛乃至自我毀滅，情色主體即是死亡的化身。文龍如此強烈的淑世情懷，部份應是出於個性使然，他一副嫉惡剛腸，在南陵知縣任上為官清正，甚受縣民肯定；為蕪湖知縣時，曾因大雨中多次來回迎送撫台的官場陋習而痛責「勞民傷財」(六十回、六十三回附記)；又有「恨不立時脫離宦海，一任我自在游行。」之嘆(九十一回附記)。^{①⑨} 由此數端約略可知他剛正不阿，清廉自持的性情。因此六十六回續論喪事，認為西門家敗已見端倪：

「故見遠者，於自己興旺之秋，還要常思退步，回顧後人。若但以旁人之榮耀為己之榮耀，其不至於淒涼也，不知今日之得意洋洋，盡是假中之假也。究亦何益於身心性命、妻妾兒孫哉？」(六十六回)

又如他從喪禮談到自己在山東弔喪的見聞，感嘆世人不講古禮，也是以孔子為尊：

「至喪禮不可不慎，即賢人之所謂當大事，夫子之所謂與其易不如戚。可見此事之不講，自古已然矣。」(六十三回)

學者指出，文人型的小說評點本來就重視社會評判、道德評判、歷史評判及政治理想，展現多元化的評點格局。^{②⑩} 文龍評點處處流露深刻的淑世關懷，與前述二家在全書義旨取向上殆無二致。不過論及更細緻的論述，則亦多有歧異之處，例如與「崇禎本」相較，後者多以「媚致可想」(第十四回夾批)、「令人消魂」(第十一回眉批)、「嬌態可人」(第十九回夾批)等讚語肯定篇中女性，對情色書寫頗有賞愛玩味之心，^{②⑪} 反映晚明蔚為潮流的情色意識；而文龍身處世風轉向保守多年的清末時期，加上

①⑨ 參見劉輝：〈文龍及其批評《金瓶梅》〉，頁 171-173。

②⑩ 譚帆：〈論中國古代小說評點之類型〉，《文學遺產》1999 年第 4 期，頁 86。

②⑪ 「崇禎本」所流露出來的女性關懷、情色歆羨至為明顯，學者亦已有所論述，如齊魯青認為「崇評」對潘金蓮進行美學觀點的評論，而非傳統的淫婦觀點。參見氏著〈明代《金瓶梅》批評論〉，《內蒙古大學學報》1994 年第 1 期；李梁淑：〈論《新

個人嚴謹的道德情操，遂多剴切批判之語而流露深度的淑世情懷。

(四)、財色貪淫之辨：讀者取向說

《金瓶梅》迤邐百回宛轉世情，復因大量的性描寫炫人耳目，令人不易掌握義旨歸趨，許多評者以含蓄的說詞模稜游移，^② 歷來各家解讀《金瓶梅》的歧議，亦多集中在性描寫的評價上。早在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已指出「作者寄意於時俗，蓋有所謂也」，為《金瓶梅》全書旨趣作了正面評價；然而《金瓶梅》畢竟取材特殊，有關全書主旨的「淫書」、「非淫書」以及「導淫」、「戒淫」之辯，在綿延多時的流播過程中，批評聲浪浮沈不定，迭起爭鳴，大抵而言以此書為「戒淫」之作已屬今日讀者共識。不過由論者的交鋒中，卻也彰顯了情色描寫所具有的複雜意趣，並非所有讀者都能對全書義旨作正向的領會。東吳弄珠客體察到全書義旨的開放性，從「菩薩」、「君子」、到「小人」、「禽獸」之說，^③ 已有今日「讀者反應理論」的觀念；其後「崇禎本」亦論及文本意義不易掌握，指出：

「摹寫展轉處，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若詆其繁而欲損一字者，不善讀書者也。」(第二回〈崇夾〉)

「讀此書而以爲淫者、穢者，無目者也。」(第一百回〈崇眉〉)

「崇禎本」肯定小說描述入微的摹寫技巧，強調讀者應細心體察，否則囿於心智怠惰，不免扭曲文本，成為「不善讀」的讀者。其說一來明揭《金瓶梅》的嚴肅意旨，同時也強調意義的完成乃訴諸讀者的器識及閱讀態度。張竹坡則說「所以目為淫

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的女性人物批評》，《中國文學研究》第十五期(2001年6月)，頁179-207。有關文龍等人對《金瓶梅》的批評涉及明清情色書寫部份，此一議題牽涉至廣，筆者將另行撰文剖析，在此不擬細論。

② 吳敢即指出評者的曖昧含糊，同註15，頁62。

③ 其說為：「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也。」。

書，不知淫者自見其為淫耳。」（〈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也是注意到讀者在閱讀活動中所具有的主體意識，認為《金瓶梅》在不同的閱讀對象之前映現了相去懸遠的面貌，讀者握有解釋權，決定文本的價值，相對地這也是閱讀的責任：

「不知真正讀書者方能看《金瓶梅》，其避人讀者，乃真正看淫書也。」（《讀法》之五十六）

「故讀《金瓶梅》者多，不善讀《金瓶梅》者亦多。」（《讀法》之八十二）其後吳沃堯等人皆強調作品的開放性，^④ 如何看待此書？是讀者閱讀心態與閱讀視野各有殊異的問題。文龍延續欣欣子及「崇禎本」、「張評」對該書的定位，其批評《金瓶梅》，討論最多的也是有關財、色、貪、淫等議題：

「然則此書實導淫之書也，作者不能無罪焉。」（九十二回）

似有責怪作者之意。然而文龍評點反覆論辯，若未綜觀全書，不免易生困惑及誤解。事實上文龍並不避諱此書的大量性描寫，進而在前述諸家基礎之上作更細緻的討論。其說亦將解釋權賦予讀者，以為《金瓶梅》「淫書，亦戒淫書也」；^⑤ 「宣淫」、「戒淫」之間的落差，文龍交給讀者自己分判，而非硬硬然拘泥於《金瓶梅》文本之批駁，可說已注意到讀者的主體意識，更強調讀者自身所須擔負的道德取向。文龍以讀者的閱讀經驗，說明傳統所重視的小說教化功能不一定是陳腐空泛的高調，而是人們可據以安頓心性、從事價值判斷的心靈活動，端看讀者是從那一個角度來判斷，這就相當吻合後世讀者反應理論的真諦而有現代閱讀觀了。如果閱讀《金瓶梅》引發效尤之心，文龍認為那是讀者的問題，讀者看書有深有淺，不能遽以責怪該書。如認為若喜看「挨光」情節者，必是淫心蕩漾，讀者

④ 吳沃堯也認為《金瓶梅》是「懲淫之作」，不過仁智之見各有不同，「淫者見之謂之淫」；引自北大版《金瓶梅資料匯編》（侯忠義、王汝梅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481。

⑤ 第一回回評：「《金瓶梅》淫書也，亦戒淫書也。」

「必須快快到底，方知《金瓶梅》不是淫書也。」(第三回)

「快快者尚有天理良心。」(第九回)

在反覆思辨論述中，文龍進而對讀者的閱讀活動作更深遠的探討。

三、文龍對閱讀活動與批評主體的省思

自晚明以降至清中葉，“文人型”的小說評點出現新的格局，亦即評點者以自身的情感和審美意趣擇取作家作品，從而作出主體性的評判、開啟小說評點的新路。^{②⑥} 評者介入小說的參與度一向甚高，甚至改易小說內容，更努力對讀者揭示閱讀指引。例如竹坡評點《金瓶梅》正是身處評點模式、評點精神皆有所拓展的清初時期，一方面時流際會使其承繼多位前人如毛宗崗金聖嘆的批評觀念，另一方面也由於《金瓶梅》文本大量性描寫所引發的爭議性，進而使其就讀者位置反覆思索。有關竹坡評點的主觀投射，論者經常引用的一段文字是：

「邇來爲窮愁所迫，炎涼所激，於難消遣時，恨不自撰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幾欲下筆，前後拮据，甚費經營，乃擱筆曰：我且將他人炎涼之書，其所以前後經營者，細細算出，一者可以消我悶懷，二者算出古人之書，亦可算我今又經營一書，我雖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住作書之法，不盡備於是乎？然則，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也哉！」（〈竹坡閑話〉）

竹坡年少時，因父親辭世、家道中落而深感人情世事起滅無常，寄情書寫或是其紓解之道，故竹坡有詩文傳世。^{②⑦} 此一創作動力後來更投注在評點《金瓶梅》上，其

②⑥ 譚帆，同註 20，頁 84。

②⑦ 竹坡十五歲時父親逝世；其〈烏思記〉一文即慨嘆一己孤立人世。有關張竹坡的身世、際遇、創作，可參見吳敢〈張竹坡家世概述〉，同註 15。

才氣縱橫而下筆琳瑯，傾注全幅心力歷時十餘日即完成十餘萬言鉅著。篇中頗多感慨之言，如自嘆不能全孝而「此恨綿綿」（〈金瓶梅寓意說〉）；甚或評點時「心絕欲死」（第五回回評）、「雙眼惟有淚出」（第七十八回回評），凡此皆不無身世之感，^{②⑧} 解釋就是開展自我，評點成了抒發心聲的園地。然而竹坡評點《金瓶梅》不僅徒為解悶遣憂，所謂「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在充滿主體意識的宣言之外，其〈讀法〉進而鉅細靡遺地闡釋閱讀法則，將閱讀話語提昇至理論層次，^{②⑨} 這些作為批評主體的自覺及其所實踐的批評，肯定讀者參與文本的完成，也顯示讀者反應在文本世界所居有的重要位置。而文龍所處時代較晚，遂能在博覽眾說之餘，進而對評點模式及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作一客觀省思，並且同樣展現富涵主體意識的強勢閱讀以回應張竹坡，透過小說批評對閱讀活動、閱讀過程、閱讀的作用及批評書寫作深度的探究。

（一）、建構意義：兼重作者與讀者的雙向閱讀

在西方文學理論中，有關文本意義解讀的相關學說迭經演變，從傳統的作者中心論到數十年以來轉向重視讀者，邇後又在作者、讀者之間反覆拉鋸論辯，說者各有所重而不易定於一尊，也彰顯了傳統以“作者”為重的因素未能完全排除。^{③⑩} 文

^{②⑧} 參見吳敢，同前註，頁 74。

^{②⑨} 林崗即指出，竹坡傾向於從主體情感解釋法的所從出；參見氏著《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四章〈小說話語與評點學的文學自覺〉，頁 102。

^{③⑩} 相關論述甚多，如 Wallace Martin,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Cornell University, 1986), p.171; 中譯《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作者、讀者並列於文本的兩側」，頁 216；以及 Elizabeth Freund *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Methue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p.104-111; 中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陳燕谷譯，台北：駱駝，1994 年 6 月）有關費什(Fish)的論述，頁 102-108。這些理論雖然不易定於一尊，然而彼此論辯過程中揭示不同的觀察視域，足資我們拓展思考的面向。

龍評點正是呈現兼重作者與讀者的雙重面向，^①一方面對於讀者個人的主客觀條件與文本的繫聯有深切體認，另一方面仍有作者中心意識，雖然並未汲汲於考訂作者身份姓名，所謂「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為誰，而但知為西門慶作也。」(七十九回)，文龍仍肯定小說乃出自一具有主體意識的創作者，以書名來說，「此書以《金瓶梅》命名，平列三人者，可以思作者之用意矣。」(八十八回)，從閱讀的起點一名稱一開始，讀者即須仔細尋繹，掌握作者謀篇佈局之用心，方能採取全書深旨而不致有所誤讀。例如論及西門慶前往東京後富貴肆淫，有財有勢，文龍有所質疑：「作者其有愛於西門慶乎？」(七十二回)一番辯駁之後繼而話鋒一轉：

「作者豈真有愛於西門慶乎？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觸而為此書也。」(七十二回)

諄諄提醒讀者不可忽視作者用心，強調閱讀時注意作者意向，以全盤掌握文本脈絡。再如針對文本「宣淫」與「戒淫」之間的落差，文龍評點反覆論析，以求逼顯小說義旨：

「乃為之詳敘生平，細言舉動，作者是何心思？批者又是何意見也？」(七十四回)

此回西門家仍保有表面的繁華興隆，文龍顯然深悟文本大量的情色書寫或易令人混淆閱讀的方向，遂有一番自我盤詢，要在警醒讀者時時扣求作者用心，切勿迷失於文本的表象世界。人物塑造方面亦主張深入詳察，如春梅先是剛烈氣傲，卻在嫁入周府後耽溺淫亂，前後大相逕庭，對此文龍先是評述「作者何必醜詆春梅一至於此也。」(九十四回)；繼而又從反諷的角度揣摩作者的深層用心：

① 在文龍的批評用語中，「閱者」或指具有現實閱讀經驗的一般「讀者」，因此本文中將逕以「讀者」稱之，以符合今日習慣用法；或指特定讀者，如張竹坡，如「何閱者責之之甚也」(五十九回)、「閱者往往重視春梅」(九十七回)。至於其所說的「批者」亦有多重指涉，或指「讀者」，如一百回；或指對小說作實際批評書寫的人；此外在批評張竹坡時也率皆稱以「批者」，可根據文字脈絡釐清所指。

「噫嘻!又安知非作者有意描寫春梅醜態，以醒閱者眼目?」(九十四回)

文龍展現了縝密細緻的閱讀過程，提醒讀者審慎面對文本，在層層反思推敲後跨越閱讀陷阱，俾能契合作者的初衷。

「從來無所羨慕者不作書，無所怨恨者不作書，非曾親身閱歷者作書亦不能成書。作《金瓶梅》者其果有所欣羨耶?其果有所仇恨耶?其果曾閱歷一番否耶?我不得而知之。然而，我固無所羨慕，無所怨恨，而我之所經歷者，耳之所聞，目之所睹，意與此書相同者，亦有與此書相異者；且有與此書相同而實異者；與此書相異而暗同者，故知作者殆亦有見矣，有所聞矣，亦嘗身親其境矣。」(第一百回)

文龍長於滔滔雄辯，更往往在反覆思索中兼顧閱讀的多重面向，從而對讀者的文思活動作細密的考察。作者與文本的關係如何?面對描摹人情世態淋漓盡致的《金瓶梅》文本，文龍設想作者經歷一番人生的悲歡情仇，這是他體認到人生經驗對創作的投射與滲透；然而讀者與文本又是如何互動?文龍認為亦不必指陳歷歷作實證追究，或同或異，作者和讀者互為主體，彼此藉由文本搭起互動的橋樑而有多重的對話關係，共現人類普遍的生命經驗。

「獨不可解者，凡事不曾經過，言之斷不可能親切如此。若謂想當然耳，恐終日沈思，亦思不到如此細膩也。是作者亦西門慶也。閱者以爲然者，亦一西門慶也。但西門慶與西門慶不同耳，不存西門之心，不作西門之惡，……閱者直可與作者心心相應，正不必嗤其肆口妄談。」(五十一回)

文龍認為小說內容必然關涉到作者的生活經驗，後者提供了小說的現實基礎，讀者也是在融入小說世界之後與作者相遇，採取其中潛在意義，進而超越文本所描述的世界以自作價值取捨。閱讀進入最後的「解釋」階段時，^② 是作者讀者的共同成果：

^② Wallace Martin, 同註 30, p.158,《當代敘事學》，頁 198；此處所指閱讀的最後階段「解

「作者訴諸讀者的自由，以合作生產他的作品。」^{③③} 文龍對讀者「自由」的期許，即是他所強調「西門慶與西門慶不同」的道德取向，藉由閱讀，讀者啟悟人生哲理並獲致實踐道德主體的契機。

(二)、閱讀活動及作為道德主體的「讀者」

文龍評點《金瓶梅》前後歷經四年的沈澱與積累，在留傳下來的評點文字中，處處可見其追跡文本世界的情思起伏。如「看至此回，忽忽不樂。」(七十九回)，是由西門慶之死思及世人亦不乏效法西門慶而共相沈淪者，因而為之心情低落；又如「看到此而不屑飛色舞、歡笑異常者，是亦一全無血性之男子也。」(八十七回)則是因此回述及武松痛殺潘金蓮而深覺大快人心。就像崇禎本有「真令人欲哭」(五十六回眉批)等真切的心聲；^{③④} 張竹坡感嘆《金瓶梅》，或曰「哭殺人、嘆殺人」(第九十六回回評)，或說「今夜五更燈花影裡，我亦眼淚盈把，笑聲驚動妻孥子輩夢魂也。」(第三回回評)；文龍追隨書中人物的思緒起落，也是千迴百轉，意氣難平。閱讀原是一件可以傾洩真性情的心靈活動，與古人照會之際，或輕喟或愁嘆乃至大喜大悲，文龍自不例外。也因為對閱讀活動中情思流蕩的真切體會，文龍進而反省《金瓶梅》以西門慶家為主軸所展開的財色世界炫人耳目，書中人物備歷物慾繁華，如此大量鋪陳性描寫的文字，勢必對讀者心靈造成莫大的衝擊，甚至沈浸其中，歆羨嚮慕，所謂「不能咀嚼世情之滋味，但貪圖片刻之歡娛。」(十一回)，因此文龍反覆思量，進而發出警惕的聲音：讀者若置身其境應如何自處？西門慶妻妾成群，文龍以西門慶為批判主軸而對美色多所措意，也導引出他對閱讀的道德訴求：

「夫淫生於逸豫，不生於畏戒，是在讀此書者之聰明與糊塗耳。生性淫，不觀此書亦淫；性不淫，觀此書可以止淫。然則書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書

釋」，當指「批評」。

^{③③} Wallace Martin 引批評家薩特(Sartre)的話，同前註，p.158；《當代敘事學》頁199。

^{③④} 全文為「寫貧家(指常峙節)一種有柴米而無恩愛夫妻情景，真令人欲哭。」

又何嘗淫乎？觀此書者，以淫人自居乎？以不淫自命乎？如以西門慶自許，須防備身後。」(十三回)

抽離其中數言來看，似乎文龍以為「生性淫」、「性不淫」乃訴諸天性，也據此解釋閱讀效應；然而文龍的思考並非如此疏略消極，而是有更細緻入微的探討，反覆思辨：

「聞之者切齒，見之者怒發。乃竟有羨之慕之，輒思尤而效之，是果人情也耶？不內自省而欲思齊焉，不能改而思從之焉，吾恐其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也。」(十八回)

其說強調讀者閱讀時的心態，須有清明的理性、強烈的批判意識，提撕自我為一道德主體，汲取人生教訓，進而廓清文本世界所可能造成的迷障。由於摻入了感性的吶喊，這些相關意見遂充滿衛道者的激情，也更強化了他的「非淫書說」，《金瓶梅》導淫抑或戒淫？關鍵即在於讀者的態度。評論中一再強調讀者的道德自覺：

「讀《水滸傳》者皆欲作宋江，讀《紅樓夢》者皆欲作寶玉，讀《金瓶梅》者亦願作西門慶乎？曰：願而不敢也。」(二十三回)

「善讀者當置身於書外，勿留意於眼前，固早恍然於其間，而西門慶之必不可效法矣。」(四十七回)

在閱讀過程中，文本往往激發七情六慾起落，召喚讀者的感官直覺，文龍並不避諱人做為欲望主體的本能反應，甚至可能浸淫其中而起效尤之心；只是在理性的觀照之下，應意識到做為「西門慶」的罪惡本質進而超越色誘。對其他人物，文龍同樣以之為告誡讀者的對象：

「善讀書者，見有同金蓮一樣者，當生畏懼心，不可存狎玩心，庶幾免夫。」(二十八回)

「看完此本而不生氣者，非夫也。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險心腸，一個淫亂

人家，致使朗朗乾坤變作昏昏世界，所恃者多有幾個銅錢耳。」「不能打破此二關，反而欣羨之、思慕之，尤而則效之，其人心術尚可問乎？其人之闇簿尚可道乎？」（三十三回）

閱讀幾乎是一種修行的進程，面對書中人物的集體沈淪，讀者若羨慕、效尤、神移、思齊、乃至思從者，下場恐將同樣淒慘；心驚、畏懼，才是應有的讀者反應，文龍的閱讀指導，其實也就是道德修為的指南。

「潘金蓮卒死於色矣，西門慶卒死於財矣，王婆子卒死於口矣。人顧何有所恃哉？曰：有。恃乎理，恃乎義，恃乎此心無私與無欲。」（第五回）

以「理義」的尺度衡量《金瓶梅》人物的財色貪欲，亦以此一觀點貫串全書、肯定全書旨趣，強調閱讀是一種心智活動，也是一種責任。再如：

「若西門慶者，固不賢不善者也。其或思齊焉，其或自省焉，其或從之也，其或改之也，是在觀之者矣。」（七十二回）³⁵

許多文學理論都指出讀者本身所賦具的殊異性，如精神分析學家諾曼·霍蘭德說：「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抵抗著和渴望著什麼，這些抵抗和欲望構成一個人接近生活與文學的特定方式」；多數分析家也都肯定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生命的藍圖，這是對生活價值的選擇，我們解釋人生、行動歸趨都往往參照它而演出，沈浸於文本時同樣也受其有形無形的規範。³⁶ 閱讀召喚出我們生命深處的真切渴求，朝著文本所開展的世界走去，進而自其中汲取心靈的養料，成就個人獨到的生命風采，張竹坡在《金瓶梅》中照見自己鬱抑失志的困窘人生，因此「不覺大哭大笑」（第七十三回回

³⁵ 其他如七十五回亦有相近之評語：「見不賢而內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幾不負此書也。」

³⁶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同註 30, p.156-158; 中譯《當代敘事學》，頁 197-198；筆者根據其意旨再加以演繹擴充。

評)⑦的率真批語時時跳脫而出，流露其至情至性也彰顯小說意旨。在文龍來說此一召喚則是道德意識的昂揚與惕勵，藉閱讀以完成人生對社會家國的責任：「苟能離身題外，設想局中，旁人之是非，即可證我身之得失。」(第十一回)，其滿懷高亢的道德激情，視此為閱讀的終極關懷。而各種閱讀效應關乎時空條件的更易，在流變的閱讀情境中，讀者彷彿也跟著百易其志，領略不同面向的文本世界，也看到了多重的自己。

「故善讀書者，當置身於書中，而是非羞惡之心不可泯，斯好惡得其真矣。又當置身於書外，而彰瘴勸懲之心不可紊，斯見解超於眾矣。又須於未看之前，先將作者之意，體貼一番；更須於看書之際，總將作者之語，思索幾遍。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復憶到第一回先。書自為我運化，我不為書網縛，此可謂能看書者矣。曰淫書也可，曰善書也可，曰奇書也亦無不可。」(一百回)

其說更進一層指出讀者的責任，閱讀是心智的挑戰，其過程有延續性不可割裂，須縱覽全書細加尋繹，思前想後與作者聲氣相感，設想其意旨歸趣，不容等閒摘取片斷強作解語，如此作品的意義是開放多重也是不確定的，讀者不慮受到限制而各取其認同的方向：

「或謂《金瓶梅》淫書也，非也。淫者見之謂之淫；不淫者不謂之淫，但睹一群鳥獸孳尾而已。或謂《金瓶梅》善書也，非也。善者見善謂之善；不善者謂之不善，但覺一生快活隨心而已。」(一百回)

小說文類本來就負載著紛繁人生的多樣風貌，其所展開的是異音交流激蕩互動的雜多世界，讀者就其中與自己生命相應的部份引發共鳴，閱讀活動無寧蘊涵了方向與選擇。相較於讀《金瓶梅》而心生效尤鼓舞欲望者，文龍並不否認人之作為一個欲

⑦ 全文為：「我不覺為之大哭十日百日不歇，又大笑不歇也。」

望主體所可能蒙受的感官刺激，也因為他意識到這層內在變化所可能帶給生命的負面效應，因此更責求讀者做為一個具有高度理性、清明自持的「道德主體」，亦必須涵養道德良知，才能從閱讀獲致人生的真理，在文龍來說閱讀活動就是戒慎恐懼、克己制欲的道德修為。如此文本被去價值化也去污名化，不淫不善，或淫或善，價值決定在讀者自己，文龍鄭重強化此一道德取向。

小說既如此攸關人生價值選擇，文龍在力求建立道德主體的閱讀方向之外，進而思及那一種讀者可以達致這些閱讀目標？讀者本身應否具備某些條件？讀者之間是否有所差異？

「閱歷深者曰：『果有此事』；見識淺者曰：『竟有此事！』」（十三回）

讀者的人生經歷見識深淺往往決定他可以從文本看到什麼？而不僅讀者有選擇性閱讀；相對地，文龍也認為《金瓶梅》並不適合對所有讀者開放，讀者也是應該被選擇的，因此他又有區隔對象之說，可謂「分級制」的閱讀指引，特別強調年少之人不宜讀《金瓶梅》：

「年少之人，欲火正盛，方有出焉，不可令其視之，聞聲而喜，見影而思，當時刻防閑，原不可使看此書也。」（二十七回）

閱讀蘊涵價值取向，文龍注意到閱讀過程中心靈所可能產生的微妙變化，所謂「聞聲而喜，見影而思」，對於心性未定的年輕少艾來說，欲望輕易被召喚，就像潮水一般流蕩而出，進而有可能迷失在文本所展開的欲望情境中，甚至不辨是非，因此應該予以禁止。對此文龍可說諄諄告誡，例如他認為若喜看「挨光」情節者，必是淫心蕩漾（第三回）；若讀之而後心生效法，則是「人之自誤於《金瓶梅》。」（第四回）。成年讀者猶未免於因為閱讀而移情轉性，何況血氣方剛未臻成熟的年少心靈？除了年少之人，文龍也認為有些人不宜看《金瓶梅》。人是一個欲望主體而有待外力約束，或父母妻子等親情規勸牽引，或學問啟迪，或畏懼刑法；否則若仗恃財勢，有損友相誘，或美色招手，則閱讀不啻加速其沈淪，因此他再三強調：「有其書即

思效其人，故曰不宜看者，此也。」(第一回)亦可與此段文字相參。至於其他年齡層及不同身份者：

「迨至中年，娶妻生子，其有一琴一瑟，不敢二色終身者，此書本可不看，即看亦未必入魔。若夫花柳場中，曾經翻過筋頭，脂粉隊裏，亦頗得過便宜，浪子回頭，英雄自負，看亦可，不看亦可。至於閱歷既深，見解不俗，亦是統前後而觀之，因不專在此一處也，不看亦好，看亦好。」(二十七回回評)

文中三種「可看、可不看」的情形，年齡的條件之外，更顧及讀者本身的人生歷練及價值取向，也是就閱讀所能產生的效應而言。對於堅守家庭價值、夫妻感情貞定者來說，《金瓶梅》呈現的渾沌沈淪不致撼動其固守的堡壘，閱讀的影響既小，故可看可不看。其次曾經快意風流者，可能在遍歷世間風情幾度眠花臥柳之後，幡然啟悟，不受美色囿限，如此看與不看，並無二致。至於紅塵翻滾、閱歷豐富者，既備嘗世情人暖，當能參透全書義旨而出乎其外，則閱讀不過印證所見，對於現實人生難有作用，因此亦可看可不看；也就是說，《金瓶梅》對這三種人物影響不深。到底讀者與文本的關係是否果如文龍所言，決定在年齡層級、家庭結構以及閱歷深淺？文龍固然簡化歸類所得，不盡能夠全面反映閱讀行為的複雜過程；不過其細加剖析的態度，彰顯的乃是他嘗試區隔、研究「讀者」的過程，面對文本時反覆思量閱讀活動的熱切關懷，或有從「讀者未必反應」之回應以為《金瓶梅》之「淫書」污名尋求解套的用心，進而思及閱讀對生活的實際影響，賦與閱讀行為嚴肅的意義。此段論述尚有下文：

「果能不隨俗見，自具心思，局外不啻局中，事前已知事後，正不妨一看再看。看其不可看者，直如不看；並其指出不可看之處，以喚醒迷人，斯乃不負此一看。見不賢而內自省，見不善如探湯，此《詩》之不刪淫奔之詞也。」(二十七回)

最後一種，「不隨俗見，自具心思，局外不啻局中，事前已知事後，不妨一看再看」

似乎與前述「見解不俗，統前後而觀之」相近，不過文龍特重後者能夠「並其指出不可看之處，喚醒迷人，斯乃不負此一看。」，此即從閱讀更進一層揭示全書義旨，也就是實際操作、批評，參與文本完成進而教化大眾的積極作為。文龍對書寫顯然深有期許，使批評提昇到感化人心的層次。有關小說的教化作用固然已是傳統小說理論的老生常談，不過文龍不同於一般只就小說本身立論，而是將重心放在評者的中介身份及引導作用，賦予評者嚴肅的社會責任，其對「閱讀」、「批評」深具自覺及使命感，於此亦可見出一斑。

(三)、從「閱讀」到「批評」

張竹坡在十餘天內完成十餘萬言的《金瓶梅》評論，固然展現其豐沛的創作能量及堅忍的毅力，不過他也說「我卻批完此一回時，心血已枯了一半也。」(第四回回評)，從「閱讀」到「批評」，誠然是更艱辛的心靈工程。而評點不僅是評者藉以抒發自我的管道，如張竹坡說「我自作我之《金瓶梅》」；同時也是聯繫作品、讀者的媒介，對此明代讀者已有所自覺，如明萬曆袁無涯刻本《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發凡》：

「書尚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也。」

說明評點乃是作者、讀者、作品多方交流匯聚的橋樑。再如九華山士《三教開迷歸正演義·凡例》³⁸：

「本傳圈點，非為飾觀者目，乃警撥真切處，則加以圈；而其次用點，至如月旦者，落筆更趣，且發作傳者未逮。」

也指出「評點」從「圈」、「點」到文字「批評」，在評賞文本之外更有參與書寫、

³⁸ 〈三教開迷傳凡例〉(《三教開迷歸正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頁4。相關討論參見譚帆：〈小說評點的萌興—明萬曆年間小說評點述略〉，《文藝理論研究》1996年6月，頁91。

進而發抉文本微旨的積極意義，是評者對批評活動的省思及自覺。羅蘭·巴特曾區分「閱讀」(lecture)與「評論」(critique)，認為前者是直接的，後者則是通過語言的中介，即所謂批評的書寫。³⁹ 巴特強調批評者所遇到的書寫問題，「批評者是一個寫作的讀者」，批評家也是個操作者，把作品的因素重新分配，批評者一定要有一種語調，也就是說，藉由書寫，「批評者」較之「讀者」更具體地呈現和文本的對話。⁴⁰ 文龍也注意到批評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對此他在相關回評中進一步多所闡發，其評點但求獨抒己見，不受前說左右，所謂「細數前批，不作人云亦云」(六十七回附記)。他對由閱讀而批評、層層推衍的困難也深有體會：

「作書難，看書亦難，批書尤難。未得其真，不求其細，一味亂批，是為酒醉雷公。」(二十九回)

「看到此回，方欲落筆，又復凝神靜坐，仔細尋思。靜氣平心，準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致貽閱者之譏，而以醉雷公呼我也。不但為批此書而然也，接人處世，排難解紛，言為心聲，聽其言亦可知其行矣。」(八十九回)

因此文龍落筆審慎，求真求細，務必情理兼顧，批評不僅面對自己，更必須接受後繼讀者的檢驗及評價。尤有進者，文龍延伸小說評點至待人處世，落實在具體的《金瓶梅》文本批評過程中，遂以竹坡為論述的對象，一路質疑，慷慨激辯，為其理念作了徹底的實踐。

四、對話與激辯：文龍對張竹坡的質疑

有清一代竹坡本《金瓶梅》一向被視為定本，文龍評點直接寫在「張評」之上，

³⁹ 引自羅蘭·巴特《批評與真實》(溫晉儀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年)，頁51。

⁴⁰ 羅蘭·巴特，同前註，頁72-74。

對話色彩鮮明，對於自己的批者身份亦有所自覺：

「作者或有深意，批者並無會心，閱者當自具手眼，別出心思，作如是觀可也，不作如是觀亦可也。」(一百回)

相較於竹坡自述「我自作我之《金瓶梅》」(〈竹坡閑話〉)，文龍何嘗不是在閱讀活動中尚友古人，沈浸於文本的世界之中，與作者對話，甚至以作者代言人自居，其意見與竹坡相左之處，字裡行間充滿論辯質疑，可說一起始即挑起批判的尖利長矛直指張竹坡。在許多旁批中，文龍屢以情緒化的強烈措辭評述竹坡，例如「看來也不是個好東西，無怪其滿口胡談，一味咒罵也，並無半句中肯處。」(七十六回旁批)；「讀不通」(七十七回旁批)；「不知是何脾胃」(八十二回旁批)；「沒見過世面」(八十四回旁批)等。何以文龍對竹坡極盡撻伐？其不滿處何在？二人歧異之處為何？文本的意義是否定於一說？文龍與竹坡的論辯，不僅彰顯一己作為批評主體的讀者意識，更由此激蕩出有關如何閱讀、如何批評小說人物的多面思考，揭示了豐富的古典小說理論以及批評方法。

綜觀文龍與竹坡的對立，主要是對書中女性的評價迥異。針對「張評」所呈現好惡分明、主觀評斷的女性觀，文龍的人物賞鑑幾乎處處與竹坡針鋒相向，流露其個人鮮明的主體色彩。竹坡厭惡月娘而推崇玉樓、肯定春梅；文龍則反其道而行，其肯定月娘而黜抑玉樓、春梅，全然與竹坡意見相左，論辯最為激烈。

竹坡質疑月娘的人格、攻訐其繼室身份、尤其再三責難她對家法禮數的怠忽。文龍則針對不同事端逐一批駁回應，約有三十回之多，^④可說是其攻伐竹坡的論述主軸。其以為「批書者何期望月娘之大，而責備月娘之深也。」(十八回)，談人格，竹坡說「吳月娘是姦險好人」(十二回)，文龍則認為關鍵在於西門慶，

「批者總以月娘陰險。試問：遇此頂踵無雅骨，臟腑有別腸，爲之妻者，將

④ 見 12.18.19.21.25.28.29.31.32.35.40.45.46.50.59.64.75.76.77.79.83-86.89-91.95.97.100。

如此良人何也？」(十二回)

為月娘辯護有加。瓶兒寄物於月娘，竹坡質疑何日歸還，顯然認為其有侵財之嫌而斥為「可恨」；文龍則認為「西門慶之娶與不娶，亦非月娘所能作主。」，並且認為有西門慶此一「兇惡丈夫，月娘何敢爭財」(十九回)。春梅金蓮被逐，竹坡斥為「吳月娘無乃太忍」，文龍則認為此為「月娘之才能」、「月娘之功，非月娘之罪」(八十六回)。直至月娘與春梅相遇而態度甚恭；竹坡則連斥「羞殺月娘」、「醜盡月娘」、「醜詆月娘」、「醜絕月娘」(八十九回回評)；對此文龍亦反唇相譏，認為是月娘「高視春梅、深愛春梅」所致。文龍也從妻妾之間的階級區別肯定月娘的婦德，認為月娘在西門慶生前有容不妒，死後守節不移(十八回)。其滔滔議論，近乎衛道者的吶喊，一再為月娘辯說，謂其「明哲保身，經權得法」(二十一回)，甚至嚴斥竹坡的閱讀動機及人格，認為竹坡「非西門慶而亦惱月娘，是又一西門慶也。」(二十八回)。竹坡對月娘的繼室身份多所憎惡，如「寫月娘惡處，又全在繼室也。」(第一回回評)，認為月娘拜求子息是「寫盡繼室之假」(第五十三回回評)；^④ 文龍因而質疑竹坡是否其與妻室之間失和，而將不滿情緒投射到月娘身上？如：

「批者深惡吳氏，實不解其故，或者其夫婦間，別有一番景況。」(二十二回旁批)

「批者於其正室必然不和，故借月娘以泄氣也。」(六十回旁批)

絮絮叨叨，你來我往，簡直視竹坡為假想敵，文龍以道德修為責求讀者，也是從這個角度批判張竹坡。其實根據學者所察，竹坡妻劉氏賢淑，竹坡卒於壯盛之年，未聞其與妻氏之間有何齟齬，亦未嘗安置側室，況且其詩文亦顯現竹坡珍惜夫妻之情，^⑤ 文龍的推斷誠然不實。不過卻也因此引出批評態度的問題：評者個人的際遇、

^④ 其他如第十一回、第十五回評皆有相近意見。

^⑤ 吳敢，同註 15，頁 18-19。

性情是否會影響其詮釋方向？文龍顯然肯定此一因素；至於隨之而來的評斷是否有優劣高下之別？依「文評」火力十足語帶攻詰的質問，當然也是有其主觀的論斷。文龍疑惑、不滿之餘，進而思考評者應有的態度，並且也將此一問題提昇到理論的層次，論及普遍的批評問題，以指導者的姿態力批竹坡：

「夫批書當置身事外而設想局中，又當心入書中而神遊象外，即評史亦有然者，推之聽訟解紛，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不可過刻，亦不可過寬；不可違情，亦不可悖理；總才學識不可偏廢，而心要平，氣要和，神要靜，慮要遠，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筆也。」（十八回）

對於批評態度，文龍以評史、行兵、治病為喻，力求持平客觀，情理兼顧，其說或未盡具體；而由其對竹坡的疾言攻詰觀之，恐其一己亦難真正實踐。然而文龍進而意識到訴諸主觀的批評，恐將造成對文本的扭曲，故又對此進行思辨。如竹坡將月娘、桂姐歸為一類，文龍有一連串的責難：

「不知何以為一流？又何以為同類？」

「西門不以為非，月娘之歡喜，亦不過好人奉承耳，何以視為可惡？吹毛求疵一至於此乎？……何惡月娘之深也。」

「顛倒一至於斯，尚可與論人論事乎？無他，有成見而無定見，存愛惡而不酌情理也。」「官哥之驚，作者明指為金蓮，李氏之不言，而曰『懼事』，吳氏之不說，而曰『惡極』，何所見而云然，謂非有愛惡之成見者乎？」（三十二回）

文龍提出「成見」、「定見」之別，其間區隔如何？其以為竹坡之所以「錯會意」，恐怕正因有成見在胸之故。文龍並不全然否決讀者自有定見，甚至他也曾考量到自己的主觀臆測或許會導致誤讀，如：

「本無此人，本無此事，我又何必與批者作對，亦因處世論事，不可少存偏

心。或者我亦偏心乎？請質諸高明之士。」(八十九回)

顯然意識到自己所受侷限。惟文龍認為竹坡大多流於情緒性、非理性的「成見」，如竹坡夾批多處指責月娘：「醜絕不堪」，「誰謂月娘為賢婦人哉？吾生生世世不願見此人也。」(七十五回)，如此明顯的個人好惡文龍不予認同，其以為竹坡不過吹毛求疵，^④由此亦知文龍的討論極其細緻，甚至論及語言的層次，一再強調評者不可存有「成見」。^⑤竹坡質疑月娘人格，文龍轉而也不齒竹坡，甚至以書中人物比擬，如認為竹坡：

「豈亦想作西門老大，而譏大姐姐不管乎？可發一噓。」(三十一回)

「糊塗甚於西門慶」，「竟與金蓮一鼻孔出氣，豈真春梅之化身歟？」(七十六回)

頗有嘲弄譏諷竹坡之意，顯然根本懷疑竹坡的批書動機及道德意識。

再者，關於禮法的實踐，竹坡也是再三抨擊月娘。例如元宵節上街，陳敬濟調戲金蓮等，認為月娘「付理亂於不聞」、「成何家範」(二十四回)；妻妾難得齊打鞦韆，送畫板的月娘「無倫無次，無禮無義」(二十五回)；收妓女桂姐為義女則是「一味胡亂處家，不知禮義」(三十二回)；竹坡顯然有相當傳統的階級意識，對於禮法也有一份緊張與焦慮，如何太監送飛魚袋，竹坡感嘆「真是末世無禮之極。」(七十一回)；陳敬濟雙姦金蓮春梅，竹坡也是特別責求「西門持家不以禮」(八十二回)。文龍則會考量人物出身，認為月娘既無詩書濡染，又非科舉之室，若「責之以守身之禮」(十八回)則是期望過深。再如玉蕭與書童私通，竹坡原評：「是作者特誅月娘閨範不嚴」(六十四回)，文龍則詳加剖析西門家中的人物關係，

「即此一回，玉蕭與書童私通，深責月娘之疏忽，而不問金蓮之縱容。豈以

④ 五十回「文評」：「閱者何必吹毛」。

⑤ 六十四回有關玉蕭書童私通之事，文龍亦以為竹坡成見。

金蓮爲不足道也，何又期月娘之太深也。此刻西門慶已死，尙可說也；今西門慶尙存，獨無責乎？後之金蓮因奸被逐，又謂月娘實殺金蓮，不解其何自相矛盾乃爾。其矣！人之不可有偏心有成見也。」(六十四回)

其以為金蓮、西門責無旁貸，竹坡不察在先，甚至連後來金蓮之死亦怪罪月娘，一切皆因竹坡心懷成見，故自相矛盾。其實在大量批評月娘「不知禮」的論述中，我們也看到竹坡頗有肯定月娘之處，如：

「月娘雖有爲善之資，而亦流於不知大禮」

「蓋月娘爲一知學好而不知禮之婦人也。」(〈讀法〉三十二)；

「然則不知禮，豈婦人之罪也哉？」「寫月娘之無禮，蓋罪西門之不讀書也。」(八十四回)

稱許為善、學好，足證月娘在竹坡心中並非全然惡質。或因竹坡過於恪守禮法，以致對月娘諸多抨擊，就這一點來說，竹坡和文龍的價值取向其實並無二致。竹坡雖有名士氣度，卻也執守儒家價值，例如屢贊玉樓為「聖賢學問」(〈寓意說〉、第一百回回評)；竹坡甚至因為過於強調經濟學問而多有拘泥之失，例如倡言全書是「為孝悌說法」(〈苦孝說〉、第一百回回評)，其說固然迂執，卻也彰顯了他對實踐孝道的焦慮。⁴⁶

至於批孟玉樓，是二人另一針鋒相向之處。竹坡以玉樓為作者自況：「玉樓為作者特地矜許之人」(二十七回)、「玉樓為作者自喻之人」(四十一回)；文龍則以為「寫玉樓真正老奸之辣貨也。」(二十五回)，不同意張竹坡稱許玉樓：

「降志辱身，避凶趨吉，此則玉樓之所長也。較之潘李孫三人，固超乎遠矣，若視為婦女中之驕者，則恐未必。」(十八回)

⁴⁶ 吳敢提及竹坡家風極其重視孝道，其妹曾割股療親；竹坡則因五因場屋而有未能顯揚雙親的痛楚，有〈烏思記〉一文抒懷。同註 15，頁 10-11。

「是金蓮陽暴，玉樓陰險，其病根總在於嫉妒。」

「若玉樓者，吾甚畏之。」(二十六回)

「金蓮之妒，明而淺，玉樓之妒，隱而深。金蓮之妒爲固寵，玉樓之妒在謀嫡。」

「批者乃被其瞞過乎？玉樓果是賢良婦人乎？」(二十九回)

「批者深惡月娘而深愛玉樓，至謂作者以玉樓自比，何其謬也。」(二十九回)

竹坡用來批判月娘的說詞，文龍幾乎皆以之攻擊玉樓而大加反彈，措辭多所責備問難，《金瓶梅》文本似乎成了攻伐的戰場。至於批龐春梅，同樣予以否定的態度：「春梅者，一傲性無理之嬌子耳。」(七十六回)。竹坡稱許春梅「心高志大，氣象不同。」(五十八回)，文龍則不以為然：

「乃閱者往往偏護玉樓而高抬春梅也，果何意見乎？其目光直不可尺計。」(五十八回)

接受美學學者伊哲指出，讀者個人的習性、經歷、想像以及所受的社會規範、文學經驗等皆有其獨特性，造成詮釋的豐富多樣，然而也因此受到既定的框架限制，彼此互相責難；學者即申論其說，指出中國文評家多樹立自己為「自許的」理想讀者，因而昧於其他詮釋的可能性或抨擊其他詮釋。^{④7} 文龍對待竹坡，可謂典型的排他反應。誰是真正的詮釋者？詮釋是否只有一種說法？文龍不僅反對竹坡，甚且認為他是作者罪人，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文龍自恃依循文本的軌跡，極力想把竹坡扭轉過來，告訴他：作為一個讀者，你偏離文本太遠了！

④7 上述觀念乃綜合單德興：〈試論小說評點與美學反應理論〉，《中外文學》(台北)第二十卷第三期(1991年8月)，頁80-81,90-92；伊沙爾(伊哲)：〈閱讀過程中的被動綜合〉，《現象學與文學批評》(鄭樹森編，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頁95,97,107。

綜觀竹坡多處從人情、事理的角度評斷人物，如評金蓮「入情入理」(二十六回)，同回評蕙蓮則說「文字俱於人情深淺中一一討分曉」；文龍亦處處衡情度理，二人立足點顯無歧異，人物觀卻南轅北轍而各自有其盲點。竹坡的「玉樓自喻說」過於穿鑿，這點學者已有定論；^{④⑧} 而文龍對月娘的迴護，則可印證其女性觀的傳統與保守。其為月娘的「正室」身份辯解，亦因此對金蓮、玉樓、春梅等其他側室投以輕蔑的眼光，可說是禮教的維護者，鞏固父權的代言人。其實《金瓶梅》作者對人物的評價殊非單一觀點，而是如實呈現人性的參差駁雜，竹坡、文龍對人際之間的情勢皆觀察入微，然因各取所好而囿於成見。文龍進而質疑竹坡的人格及批書態度，認為他自作聰明、自相矛盾、自迷其目以及自有成見，其實文龍所不滿者，正是竹坡風格獨到之處。竹坡穎慧疏狂，^{④⑨} 其評點《金瓶梅》在十餘日之內揮毫立成，意到筆隨之處自然不遑多加修飾，興味所寄酣暢淋漓，一任才氣噴薄而出；益以身世窮愁之感，遂成就主觀鮮明的個人色彩。文龍對竹坡深表反感，卻也難掩個人偏見，思及自己同樣是作者之外的「閱者」之一，有「我亦偏心」(八十九回)的可能，又何能逕為作者代言、甚至疾聲吶喊？從接受美學角度觀之，文龍不滿竹坡之處未必盡是竹坡有誤，而逕可視為不同的期待視野所致，^{⑤⑩} 彼此實可互為補充。

況且文龍攻伐竹坡雖不餘遺力，「文評」卻明顯於「張評」有所承襲，前述儒家生命情調之外，如竹坡對閱讀態度、讀者修養等著墨甚多，^{⑤①} 文龍可說在其基礎之上擴而充之。此外竹坡也暢論齊家修身之要(六十九回、七十五回、八十四回)，

④⑧ 參見楊義，同註 6，頁 389。

④⑨ 吳敢，同註 15，頁 106。

⑤⑩ 「期待視野」是德國接受美學學者 Hans Robert Jauss 的理論，是指閱讀作品時，讀者之前的文學閱讀經驗構成其先在的思維取向，參見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Chapter 1; 周寧、金元浦中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走向接受美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一章。

⑤① 如「崇禎本」(第二回〈崇夾〉)、竹坡、文龍皆強調讀者須「善讀書」。相關討論參見朴炫珩：《張竹坡評點〈金瓶梅〉之小說理論》(台北：政大中研所碩士論文，1995 年)，頁 160-168。

並以此評斷月娘、西門之失，凡此皆與文龍相近。再如文龍分析全書「間架」：

「此書之間架已成，所謂一小結束也。此後當從何處落筆，以定其罪案，而漸洩作者之本旨，喚醒癡人也？」「作者於是徘徊四顧，月娘則在上房矣。」、「嬌玉雪亦在門之內」、「金瓶梅皆安置園中」（第二十回）

其閱讀《金瓶梅》與作者聲氣相應，似乎如見作者一一思量琢磨居處，貼近了書中的人物脈動，體察到妻妾之間的權力分配，此一空間觀察其實也受到竹坡評點的啟發，^{⑤②} 足見二者之間揭示「解釋」有其差異性、多樣性之外，也存在著連續性。^{⑤③}

「文評」直接與竹坡對話的特殊批評方式，令文龍得以以後繼者的強勢姿態咄咄逼人，形成小說批評史上的特殊實例。我們看到一位文學關懷者對小說所作精微思考，也真切體會到其人的耿介性情與雄健筆力。每每竹坡三言兩語即引來文龍的長篇大論，批評是個人心靈的投影，「文評」可說對此作了具體的實踐與呈現，而可貴之處，即在其時時反躬自照，不忘向內思索：自己所思所書為何？意義何在？對身為「讀者」及「評者」的身份可說有充分自覺。例如：

「然則何以如此深罪婦人也。批者未免心偏，故我不自覺其言之長也。豈有私心乎？亦不平之鳴耳。」（十九回）

對評點顯然深具匡正竹坡的使命感。不過他也有幽默的一面：

「分明一群酒鬼、色鬼、勢利鬼，說鬼掉鬼，鬼鬧排場而已。我亦借此書信手批之，鬼混而已矣。」（六十六回）

此一自嘲之語沖淡了文龍攻勢凌厲的火藥味，「文評」向後世讀者展現：原來批評

⑤② 竹坡《讀法》說：「讀《金瓶》，須看其大間架處。」；〈雜錄·西門慶房屋〉也對西門家妻妾居所的空間分配有詳細剖析，學者即肯定此為竹坡之創見，參見楊義，同註 6，頁 391。

⑤③ 關於解釋的連續性，參見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同註 30，p.171；《當代敘事學》，頁 216。

是如此可以標舉個人風格、主體意識的心靈活動，也是具有個人創作義涵的書寫，文龍力批張竹坡，一方面彰顯作品的開放性，讀者自主；更由踵繼者的意見，呈顯評論者之間的交流與對話。近世西方文學理論多強調閱讀、批評的主體性，^{⑤4} 竹坡充滿創作的動力，雖在規範之中卻又力求超越，他的獨抒己見，揭現了閱讀允許想像與虛構、閱讀存在差異性、閱讀允許自常規常理中解禁釋放；文龍對張評所作意氣激昂的再批評，同樣彰顯了評者難以割捨一己的人生經驗，以及念茲在茲的生命課題，文龍高亢的語調鼓舞著道濟天下的使命感，也讓後繼讀者看到對話所開展的豐富向度與力度。正如西方的相關論述到後來往往是在客觀性與主觀性之間游移，文龍與竹坡的論辯，或許也不必定於一尊或強分軒輊。何者方為達詁？答案實有多種可能，繁複多樣，一如人性與人生。竹坡評點或笑談人生或哭斷肝腸；文龍則是岸然道貌為蒼生抱憂，二者可謂各擅勝場。在傳承與辯駁之間，《金瓶梅》的解讀沒有底線，來日有俟更多的讀者繼續填補文本的縫隙與空白。

五、結 語

從明清小說批評史的發展脈絡來看，文龍批評《金瓶梅》已屆清末，其評點明代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以人物為中心、盱衡世局等，形式、取徑大體仍沿襲小說評點之傳統，^{⑤5} 價值取向亦有所承繼，時時為維護傳統禮教而大聲疾呼，或討論《金瓶梅》主旨、或評價人物，無不以道德意識為主要考量。就這一點來說，他與《金瓶梅》所屬晚明時代著重心靈自由的精神可謂相去已遠，而毋寧賦具清初

⑤4 單德興，同註 47，頁 91；伊沙爾，頁 106。

⑤5 參見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 年），第二章〈晚清小說評點的三個趨勢〉，篇中論及晚清小說評點趨勢之一，即是承襲以前文人評點傳統，繼續對傳統舊小說進行「舊」的評點。另參見譚帆：〈清後期小說評點塵談〉，《學術月刊》2000 年第 12 期，論及清後期小說評點之批評旨趣、功能、視角等，皆有傳統小說評點之餘波，文中亦舉文龍之批評為例，頁 74-75。

以還士風保守的時代烙印。然而他力抨張竹坡的雄健對話，卻又流露不受傳統拘泥的主體意識。文龍身處小說理論蔚為大觀的晚清，⁵⁶ 彼時正是小說理論、小說觀念有所革新的時期，文龍讀書既豐，⁵⁷ 實有可能潛在中受到評點小說的時流影響，對閱讀批評活動轉而有更趨細緻的體會，也在相關的書寫活動中寄寓了自己的心靈記錄。⁵⁸ 當時報章曾出現專論閱讀態度、重視讀者的文章，文龍所論即頗有與之契合之處。⁵⁹ 相較於多數評點側重實際操作，文龍評點特重閱讀活動及批評本身，其所開展的面向誠有獨具的意義，特別是作為批評主體之「讀者意識」的彰顯，此一堪稱新的批評思維使其論述帶有時尚的新色彩。因此學者認為文龍的批評「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對《金瓶梅》這部小說自身的批評」，⁶⁰ 我們亦可據此肯定其在小說批評史上應有一席之地。

(本文之寫作獲國科會經費補助，為專題研究計畫 NSC89-2411-H-002-059 之研究成果)

⁵⁶ 「晚清」一詞，一般多界定為鴉片戰爭(1839)至辛亥革命(1911)期間，文龍評點《金瓶梅》時正屬晚清時期，參見註4。

⁵⁷ 文龍曾自謂「有閑書癖」，轉引自楊義，同註6，頁402。

⁵⁸ 譚帆在〈清後期小說批評塵談〉一文中即引文龍此段批評，認為是「文人個體自賞性增強」的表現，同註54，頁75。

⁵⁹ 參見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論及《新世界小說社報》〈讀新小說法〉一文，內即討論閱讀方法及讀者素養等問題，文載《新世界小說月報》第六、七期(1907年)，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73-279。

⁶⁰ 劉輝，同註4，頁180。